



清华  
东方  
文库

李廷江 王中忱 主编

#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日本研究

——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高级培训班讲习录

高 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 与日本研究

——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高级培训班讲习录

---

高 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日本研究：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高级培训班讲习录/高柏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11

(清华东方文库)

ISBN 978-7-5097-4192-4

I. ①西… II. ①高… III. ①社会科学-研究-西方  
国家②日本-研究 IV. ①C15②K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4296 号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魏小薇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责任校对 / 孙光迹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192-4

定 价 / 68.00 元

印 张 / 16

字 数 / 192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清华东方文库编委名单

(按姓氏笔画)

入江昭	大塚豊	王中忱	王 成
王亚新	毛里和子	平野健一郎	冯 峰
西村成雄	刘岸伟	刘建辉	刘晓峰
杨 舰	李当歧	李廷江	张启雄
季林红	赵全胜	胡洪营	袁本涛
晏 妮	高 柏	黎 宏	

### 主 编

李廷江 王中忱

### 执行编辑

李 佩 丁兆中

## 编者的话

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是清华大学校属跨院系的研究机构，致力于跨学科、文理交融的学术研究，注重产学研与社会效益并举的多层面交流。作为中心学术活动的一环，于2009年6月26~28日举办了首届高级培训班。此次培训班邀请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就日本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集中讲座，由李廷江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青岛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的博士生、讲师和教授40余人参加了培训班。主讲人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日本研究”为主题进行了三次系列讲演。在此期间，佳能（中国）公司总裁小泽秀树以“对中国的日本研究的期待”为题、清华日本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廷江教授就“中国人的日本观”分别做了特别演讲。

高柏先生曾取得中国北京大学学士、硕士学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其大作《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sup>①</sup>

---

<sup>①</sup> Bai Gao, *Japan's Economic Dilemm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在纽约出版，中译本20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sup>①</sup>；《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sup>②</sup>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在纽约出版，荣获1998年度美国大学出版社联合会有泽广巳日本研究最佳图书奖，200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sup>③</sup>

在本次培训班上，高教授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日本研究之间的张力为主线，结合自己20余年的研究经验，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研究中的两次范式之争，并讨论如何在全球金融危机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认识日本的现状与未来，以及日本经验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历史关系与同时代性。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都受其所在的文化、历史、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从对西方国家现实的研究中抽象出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被用来分析与它们在各方面的情况有较大差异的国家时，就自然产生理论和实证材料之间的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在西方的学术界经常构成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范式冲突。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在美国研究日本问题，无时不面对这种张力与冲突，如何超越它们，进而确立个人研究的分析框架，进行创新性思维，请看高柏教授的精彩阐释及课堂争锋。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次培训班所讲授内容，在附录部分，我们选编了高柏的两篇论文。这两篇文章原以英文在国外发表，中文版是首次在国内刊布，高柏教授授予版权，谨此致谢。

---

① 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刘耳译，商务印书馆，2004。

② Bai Gao, *Economic Ideology and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Developmentalism from 1931 to 19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出版社，2008。

# 前 言

——写在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高级培训班讲习录出版之际

李廷江

从古到今，中日关系特殊复杂。仅就近代史而言，经历了从19世纪末的甲午海战，到20世纪中叶的中日战争，日本成为在上两个世纪内的五十年中接连挑战侵略，向中国发起了两场重大战争的强敌。然而，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百年后196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的增长奇迹，日本的发展和经验同样成为19世纪清末新政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极其重要的样板与契机。中日之间的敌对性与互补性只是到了1972年才出现良性转换。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为两国交往带来和平互助友好的春天。遗憾的是好景不长，时代的车轮已经驶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今天，日本的国策依然是困扰中国外交政策的棘手对象，日本的经验依然不失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有效范本。水以浪得恶名，浪何尝非水乎？于是乎，对抗日本和学习日本构成了百年中日关系的错综复杂。

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悠久，涉及学科领域广泛，前贤同仁建树成果丰富。这是每一位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都引为自豪，权为认真工作，努力赶超的源泉动力所在。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

由于时代的原因，中国的日本研究无论是距离社会的要求，还是和国际上学术界相比较，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继承前辈学术传统，开创适应时代需求的学术研究，成为摆在每一位研究者面前的当务之急。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日浅，既无基础又乏经验。但是，作为中国大学的研究日本机构，理所当然地要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学术服务，义不容辞的要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快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鉴于一些学者迫切需要了解国内外研究动向，希望研讨日本研究方法等的现实要求，我们设想，如果能采取讲习的形式，提供交流切磋的平台，以学术为主，又联系现实，讲习并举，雅俗结合，以促进客观认识日本社会本质，提高学术研究方法能力，这样下去，持之以恒，一定会有益于提高我们日本研究的水准。本着上述宗旨，我们设计举办了清华大学日本研究高级培训班。这是我们尝试为日本研究同仁后进提供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和信息，建立和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的第一步。

2009年6月，我们举办了第一期清华大学日本研究高级培训班。《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日本研究——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高级培训班讲习录》是这一期讲习班的讲习记录与报告。学术乃社会之公器。讲习班每年举办一到两期。只要条件容许，我们决心努力把讲习班办下去。献给大家的讲习录，愿和所有关心中国日本研究的同仁共享。



# 目 录

第一讲 关于日本资本主义性质的辩论：实证材料、方法和视野 ——以《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 1965年的发展主义》为例 .....	1
【讨论】 .....	35
第二讲 关于日本经济逆转的辩论 ——以《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 根源》为例 .....	55
【讨论】 .....	84
第三讲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日本 .....	104
【讨论】 .....	139
【关于培训班的反馈意见】 .....	165

附 录 ..... 171

全球化与意识形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体系充满矛盾的

方 方 面 面 ..... 171

有泽广巳及其管制经济理论 ..... 194

# 第一讲 关于日本资本主义性质的 辩论：实证材料、方法和视野

——以《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  
1965年的发展主义》为例

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个人的背景。我是1979年进入北大东语系日语专业学习，1983年毕业的。毕业后同年进入北大高等教育研究所读硕士课程，专业是比较高等教育。当时的论文题目是导师承担的国家“六五”计划的一个重点项目的子课题，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100年里日本高等教育结构的演变以及背后的原因。1986年1月毕业后留校，也没有教书，只待了半年就去了美国。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社会学的博士学位，从1993年开始一直在杜克大学教书。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东西算不上讲座，而是一种培训班的形式。培训班在美国一般是互动比较多。我在日本访问的时候也看过日本大学的培训班，经常是一个学生负责报告。在美国对研究生要求要多一些，课前要先把指定的资料读完。在课上有一人导读，大致讲一讲，负责提出问题，然后大家都参加讨论。

这次培训班每天的时间分配，大致分成三部分，一次大概是50分钟，中间休息5分钟。我每次先讲一个具体的日本研究领域

里的理论辩论情况，以及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大的辩论。第二部分讲一下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或者是怎么参加辩论的。第三部分的时间给大家提问和讨论，你们甚至也可以把自己在做的东西提出来让我来给些建议。

在美国上课，很多教师一开始就讲他们的教育哲学。教本科生时，我的教育哲学是强调三个层面：知识、技能和视野。到了研究生阶段实际上还是一样，只不过是把知识变成了实证材料，把技能换成成分析方法，把视野换成分析框架。所以，西方研究者在进行社会科学分析时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即如何获得实证材料，使用什么样的分析方法，和选择什么样的分析框架。

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要想做一个好的学者，最好是在这三个方面都要有自己的想法，争取都有所创新。你如果在这三个方面做不好的话，最后很可能要影响研究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互动的形式非常有用，大家可以随时提问。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可以举手说出你的理由。

第二部分我要交代一下从知识社会学的基本观点来看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学术范式。中国人一般的观念认为：所谓的科学就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这是咱们上本科甚至是上中学的时候大家就知道的。但是知识社会学并不这样看问题。它认为研究人员所处的环境，不论是社会环境、历史环境、政治环境还是经济环境都会影响你从事社会科学分析时的分析框架，甚至实证材料的选择。所以说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绝对的客观规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与他们所研究的客观对象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在互动的过程中围绕研究人员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

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大家就会知道学术范式是会发生变化的。托马斯·库恩论述科学革命的那本书是1950年代出版的

名著，中文译本早就出了。他是第一个讲科学是有范式的，这种范式在历史中是发生变化的。既然会发生变化，显然你就要问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发生变化的原因就是围绕在研究人员周围的各种外在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研究人员在分析一个社会现象时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甚至实证材料的选择。

之所以讲这些，目的是给大家交代一下我们要想理解在美国学术界关于日本研究的大辩论，首先要明白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进行辩论。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你就可以发现这其实是因为围绕着研究人员的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这就涉及每个具体的研究人员怎么认识外在环境。每个人对外在环境的认识并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发给大家的大纲里提到研究范式。与研究范式有关的辩论经常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经常是很强烈的。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很多研究人员对他所信奉的对外在环境的理解可以达到一种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甚至是宗教色彩的地步。到了这个份上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永远受社会变迁、社会条件本身的制约。比如，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如何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出来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市场理论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大家都相信市场是一个好东西，而计划经济的好多东西是不好的。到了四五年前，中央开始强调要建立和谐社会，大家对全球化的反思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时候大家又发现在过去的20年里不光是中国，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思潮，这个思潮影响的政策范式也有很多问题。由此你可以看到，这种人们对经济模式认识的前后变化显然是人们周围外在环境的变化造成

的。这种认识的变化会直接导致研究者采用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甚至是研究实证材料选择的不同。这是知识社会学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与学术范式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的基本观点。

下面，我们就具体介绍一下美国学术界内部的特点。在美国学术界，研究外国事物的学术范式主要有两种形态：一个是地域研究，另一个是理论建树。

美国的社会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制约。为了冷战的需要，美国的政府部门和私人基金会提供了大量的科研经费，研究所谓敌对国各方面的情况。由此产生了地域研究这样一种范式。

**地域研究**的范式从某些方面而言与我们中国人平时做的研究有很像的地方，与日本人做的研究也有重合的地方。你要想解释一个事，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什么是就事论事？比如说你要以为什么清华大学成立了日本研究中心这件事作为一个课题的话，研究人员如果按地域研究这种范式来做的话，他会去采访所有曾经参与这个过程的人，理清建立过程具体的演进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哪些人发挥了作用，比如说像李教授，像曲教授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地域研究一般采用的是归纳法，研究人员把所有的材料都找出来，都理清楚，然后进行归纳，得出结论。

**理论建树**是一个什么范式呢？理论建树关心的是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想建树理论，这个理论不能只在这一个地方好使，那不叫理论。理论必须是普遍适用的，必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各位学过经济学的话，那就是一种理论建树的典型方法。经济学使用的是演绎法。你从抽象的数理逻辑出发，给出一些假设，然后就建立自己的模型。做数理经济学的还可以收集实证材料去检验这个假设。这个过程

就是理论建树。后面我要讲到当你研究一个具体的国家时，这些跟理论建树的关系。

要研究一件事情，按照地域研究的步骤，就是把所有的与事件有关的要素解释清楚，找到前因后果，能找到的具体情况都找到，对它进行归纳，最后就能得出某种结论。

可是理论建树要求不一样，不一样该怎样做？我刚才提到，理论建树一般是用演绎法。从既存的理论出发，提出假设，然后再搜集实证材料去验证。对上了，证明这个理论是对的，没有对上就可以对这个理论本身提出一个质疑。

经济学在战后走的就是这条路。在这个过程中弗里德曼在1953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那篇文章中援引了波普尔的证伪理论，认为经济学理论可以由经济学家依靠逻辑来推出。你可以设定各种假设条件。如果在这个条件得到满足时，你建构的模型就应该能够预测结果。在没有实证材料证明我这个模型是错的之前，它都是对的。这样一个方法论思维的逻辑与归纳法完全不一样。归纳法认为在你知道所有事之前你什么都不知道，只有老老实实去查材料你才能知道。而演绎法认为我的任务只是要依据数理逻辑推出一个模型来，证明我说的对不对是别人的事情，只要没有人证明我是错的，我就是对的。

在西方研究日本也好，研究中国也好，我们经常面临着两对矛盾的困扰，一个是就事论事的解释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之间的矛盾。另外一个，是象牙塔里的学问与时代变迁之间的矛盾。

我先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按照地域研究的方法，我们要了解一个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中的所有实证材料。搜集这些材料后你能归纳出来什么东西就归纳出什么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就事

论事。而按照理论建树的方法，你光在一个地方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为什么发生没有意义，你发现的东西要放之四海而皆准才行。但是按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搞来搞去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经常是象牙塔式的学问。就是学者坐在书斋里想，坐在计算机前搞数理模型。只要满足一定的假设条件，这个模型就被认为是好使。但是问题是这些假设条件本身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无法得到满足。这样就导致了象牙塔里的学问没法适应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当时代在不断地变化的时候。

如果你们关注日美关系的话，在1990年代末期日本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已经不再把日本当回事了。为什么呢？因为在1980年代，当日美贸易逆差特别严重的时候，美国把日本视为是主要威胁，十分重视。到1990年代，特别是克林顿转变了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以及日美在1995年汽车谈判以后，美国人开始绕过了日本，好多事直接找中国谈了。到了1990年代末的时候，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已经没有人再关心日本了。

所以随着中国的崛起，你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讨论任何与日本有关的问题，中国都成为重要的参照系。反过来说，我们在理解很多中国的事的时候，日本也变成了参照系。

这表示时代条件的变化可以极大地改变你讨论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的范式。我想曲老师和李老师早年在日本的时候，一定对“日本人论”有印象。什么是日本人论呢？当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如日中天的时候，西方人觉得日本的什么东西都好。日本人自己也很兴奋，认为日本就是与别的国家不一样。于是把天照大神之类的文化遗产都可以端出来解释日本的成功。但是等到1990年日本的股票市场一垮，这种文化解释论顿时就失灵了。那些神社还在那儿呢，怎么这回就不行了呢。用传统文化解释当代的时候



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文化的东西不是说变就变的。你过去说文化导致了你的成功。你的经济现在突然不灵了，但是你的文化还在那儿。过去你说是有了它日本才成功，但是现在文化并没有变，日本应该还成功才对，怎么就不成功了呢？这个文化解释论显然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分析框架必须能够反映时代的变化。你要是不能与时俱进地改变你分析事物的分析框架，那你就要落伍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在美国你要是想分析其他国家，日本也好，中国也好，你经常要面对这两对东西的困扰，放之四海还是就事论事。你如果走极端，很容易变成象牙塔式的学问。你必须赶上时代的变化，所以你经常要在你的分析框架上处理这个变化。

下面讲一下西方所谓的理论。无论是地域研究也好，还是理论建树也好，西方的社会科学都要解释，都有所谓的理论。你如果一开始就决定走与地域研究的人不一样的路，怎么来进行理论建树呢？我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逻辑：首先第一件事什么叫理论？理论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是特别抽象，特别深奥，特别玄的一些东西。这样的东西才能被称为理论。而西方的理论，特别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理论，则是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一个系统阐述，这才叫理论。这两个变量一个叫自变量，另一个叫因变量，自变量决定因变量。

比如说你要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你要解释的因变量。你需要去找一个自变量来解释它。你可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你可以说是邓小平出山，你可以解释是当时全球化的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失败等种种理由。你可以选择这些理由中的任何一个作为